

依違之間

——晚年張元濟的認同和尷尬

• 宮 陳

摘要：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中國近代出版巨擘，長期主持商務印書館工作，建國後曾任上海文史研究館館長。既往研究對於晚年張元濟的關注主要側重於其關心國是、參政議政的一面，而對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缺乏細節性考察。本文通過梳理分析1949年張氏受邀北上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心態，與藏書家劉承幹等人的交往，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的表態，辭受上海文史館館長的過程等事例，藉以展現在新的國家治理體系建立過程中，以張氏為代表的深受傳統思想觀念影響的「文化老人」的自我調適狀況，進而考察建政之初中共與這類群體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張元濟 劉承幹 商務印書館 「文化老人」 知識份子

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中國近代出版巨擘，歷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務，建國後任上海文史研究館(以下簡稱「上海文史館」)館長。1952年初，歲屆高齡、臥病經年的他自感來日無多，寫下了數篇向各方親友告別的詩文，其中《別商務印書館同人》一詩云：「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穫仗群才。」是年秋，老友李拔可因病謝世，張氏在悼念故人的輓詩中云：「三峽歸來長別離，舊遊空自憶峨眉。故人泉下如相問，已老春蠶尚有絲。」^①

從這些詩句中可見，一位熱忱國是、獻身文教的「文化老人」的形象躍然紙上。長期以來，學界受到類似的張元濟自身留下的材料影響，對其進行研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項目批准號：19ZDA235)的階段性成果。感謝三位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修改意見！文章初稿幸得張仲民教授斧正提點，修訂階段又獲編輯大雅改錯糾謬，謹致謝忱。惟文責自負。

究時往往帶有標籤化的現象，或多或少地存在忽視語境、以人物自身視角就事論事的局限；尤其是對張氏晚年形象的勾勒，主要集中於文化出版家或愛國老人的一面，各類有關張氏的傳記敘述其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行迹時，大都重點圍繞《涵芬樓餘燼書錄》的編纂、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政協會議）、關心國事等內容展開，兼及商務印書館的公私合營、個人晚年的生活日常等^②；更有論者將其稱為「不朽的完人」，對他在弘揚國故、啟迪民智上的貢獻不吝溢美^③。

而事實上，這些後來者的評價與一些時人對於張元濟的觀感大相迥異。鄧之誠在聽到張氏去世的消息後，論其一生行狀稱^④：

報載：張元濟於十四日死於上海。此人以遺老自居，而罵清朝。勝利後，反對蔣中正。解放後，勇於開會，當場中風，臥病數年，今始化去。在商務書館發財二三十萬，為人綁票，去其大半。淪陷後，驟貧，先賣住屋，後並所藏批校本書籍而罄之。八年前，曾以《翁文端日記》賣與燕京大學。一生刻薄成性，能享大年，亦甚幸矣！

無獨有偶，長期供職於商務印書館的蘇繼頤在與開明書店的王伯祥交談時，也曾論及張氏為人，他與鄧之誠的某些觀點十分相近。王伯祥記述：「會前蘇繼頤見過，談移時，知商務張菊生待人之刻，備極勢力，頌久、伯嘉之死，敬農〔朱經農〕、緯平之逐具見酷毒，尤以三年前去緯平為不當之至云。」^⑤在其看來，新中國成立前夕張氏排擠商務總經理朱經農、逼使其辭職，並辭退館內老人傅運森（字緯平）、周昌壽（字頌久）、李澤彰（字伯嘉）等人，皆說明他行事霸悍嚴苛；特別是周昌壽因腦溢血猝逝，與商務對其待遇不佳有直接關係，「憶踞寇謀佔滬出版業時，頌久力與折衝，商務書館賴以保全，乃一朝慘勝，便爾屏之，致抑鬱至此，不能不令人致憾該館之深矣」^⑥。如果說鄧之誠不過是一般的「局外人」，對張氏的評價或有道聽途說的成份摻雜其中、不足採信的話，那麼蘇繼頤作為長期與之共事的商務內部人士，所見所感應並非空穴來風。

由此可以引發我們思考的是：為何時人對張元濟的品評與後來者截然不同？晚年張元濟究竟有着怎樣的心態與形象？本文不擬對其晚年行迹作面面俱到的羅列，重點聚焦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若干活動，利用張氏及周邊人物的材料互相補充印證，希望通過對細節的關注來豐富我們對於其人其事的認知，並在此基礎上考察建政之初中共與這類「文化老人」的互動關係。須略為補充的是，筆者在這裏無意進行概念化的創造，所謂「文化老人」的指代只是為行文簡便而用，主要涵蓋對象是清末民初以降的耆宿遺老、碩彥名儒，但因各自經歷、年歲等的不同，參與「文化」的程度、先後亦有差別；以本文的主人公張元濟為例，他雖有晚清翰林、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等文教身份，但與之相應的還有商人、資本家的一面，故對於新中國成立後「文化老人」的不同情況仍需具體分析。

新中國成立初期新政權與文化界的交流情況，特別是中共對於知識份子的改造等議題，一直是學界較為關注的領域。從接受者的角度加以梳理，既

往的研究成果在敘述邏輯上主要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模式：一是着重於政權更迭之際的新舊差別，從信服、合作、感恩角度出發，強調知識份子在新環境下的成長。有論者即指出，這一時期知識份子的心態是「以喜為主，喜憂交織；主動適應，積極調整；漸感自卑，努力重塑」^⑦；而其改造過程，則是「自覺而不自願」的^⑧。二是將知識份子在此過程中的種種不適、彷徨、痛苦乃至於撕裂的一面放大，凸顯悔罪受難的敘事角度^⑨。筆者認為，圍繞這一時期知識份子與政治的關係除了前述考察視角外，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間：首先，就研究範圍而言，無論是何種敘述思路，都把「知識份子」的概念界定相對窄化，將其視為與政治活動關係較密切的中間人士或在各類機構院校工作的科研學者^⑩，而對於此範圍以外的群體則關照不夠；其次，就研究邏輯來說，不管是強調知識份子的涅槃重塑或是徘徊掙扎，都不免偏重一隅，有失豐富性。

職是之故，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首先是張元濟受政府邀請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的辭受往返過程；其次是他與劉承幹等人的交往以及對於家鄉江南地區的徵糧與土改政策的態度；再次是其既有與官方積極互動的一面，也對中共過份強調階級鬥爭的治理模式多有不滿，尤其是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的思考覺悟，以及隨後在辭受上海文史館館長中與官方的交流互動；最後將張氏與同時代的其他人物作比較，以此展現這類深受傳統思想觀念影響的「文化老人」在新的國家治理體系建立過程中的因應調適。

一 北上參會：「難於堅卻」

1949年初北平解放後，中共中央決定盡速召開新政協會議，邀請包括張元濟在內的各黨派人士、社會賢達、各界代表共商國是。過去的研究在談及張氏暮年北上赴會時，往往會結合他在開會期間建言獻策的積極表現，藉以塑造其與時俱進、愛國向上的形象。誠然，無論是張氏本人還是其在經營商務印書館的過程中向來聲稱不涉政治（如1919年孫中山有意將氏著《孫文學說》交予商務印行，但館方不願介入南北政局矛盾，認為此事「恐有不便」，「不如婉卻」，遂以「政府橫暴，言論出版太不自由，敝處難於抗，只可從緩」為託辭拒之^⑪），新中國甫立便一反既往，不單參政議政，並且出任政府職務，這些言行無疑體現出他善於審時度勢。同為政協會議代表的張難先在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言時即專門指出，「本席這個小組的代表中如張代表元濟、周代表善培，都是七八十多歲的人，數十年不願參加甚麼政治性的會議。……卻是此次所召開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大家都歡欣鼓舞，不顧衰老，毅然參加，這實在是看見解放軍軍紀之好，政府人員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總司令之英明領導所感召。就這幾位老先生之參加看來，真可以代表全國人民之心悅誠服的擁護人民政府。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故本席附帶的報告一下」^⑫。

但不為人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官方與張元濟之間圍繞受任代表、進京參會一事先後有過數番敦請與請辭，辭受往返之間更能體察他作為一個老派文人的行事姿態。1949年8月，既是商務印書館董事也是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

會常委副主任的陳叔通，告知張氏已將其列入會議特邀代表之列，張氏很快回信予以推辭^⑬：

昨日又奉到手教，知新政協商列入賤名，並蒙諄諄之誨，寧不感動。然再四思維，實有難於應召之處。其原因縷述如下：弟素不稱老，且思妄附少年。但近來腦力漸覺衰退，每思一事，甚易坐忘，遇有需費鑽研之事，思慮亦復不能深入。吾兄老當益壯，弟實自愧不如，似此衰孱，有何裨補？一也。中共諸子多非素識，在會中者，屈計故交大約不及十人。氣類太孤，殊覺岑寂。二也。素性慤直，不喜人云亦云，況值此國家多難，又重以弓旌之招，若緘默不言，實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淺言深之譏。三也。都門親故雖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闊別，既舊遊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平空添出無數應酬，亦大苦事。四也。小兒新華一席，生計所繫。近日督導開會，倡議裁汰，其職務已不絕如縷。來書屬令伴弟北行，自須請假，必被順水推舟，從此失業，以後何以為生？弟若踽踽獨行，征〔途〕旅舍，事事躬親，亦復精力不逮。五也。以此數端再四躊躇，只可方命簡書未發，務乞善為我辭。

張氏所開列的五條理由看似合情合理，然而如果結合前後材料加以互證分析，則可見其言辭懇切背後不無舊式文人習慣使然。

首先，張元濟以年老體弱為託詞，這是他謝絕政治活動時慣常使用的理由。1948年底，潘公展、杜月笙等人集合滬上各界名流發起成立上海自救救國會，將張氏列入「行動委員」名單之中，他在得知此事後馬上登報聲明，以「年力衰邁，凡社會公共事務不克擔任，久經謝絕」為由，予以拒絕^⑭；並且對周圍友人說，「我已經是八九十歲的人了，平日正以步履維艱為苦，如何還能夠跟着他們『行動』呢」^⑮？但事實上，張氏身體仍然十分健康。上海解放前夕，顏惠慶某次前往張宅拜訪，歸來記述，「訪問菊老，他仍很強健」^⑯。迨至1949年9月張氏親臨北京參與新政協會議，在與各方的接洽應酬中精力充沛，見者無不對其身體健康狀況大加稱讚。葉聖陶在日記中就曾提及張氏設宴招待諸人的情形：「午刻，偕雲彬至歐美同學會，應張菊生先生招宴。余前在商務，未嘗與張見面。此次張以參加政協來平，八十三歲之高齡，望之如六七十歲。同座皆與商務有關之人，賓主凡十六人。菊老言五十年前見光緒於勤政殿，又言戊戌政變時所謂新黨人物，皆已作古，渠為魯靈光矣。」^⑰與之同席的宋雲彬在日記中也感慨道：「菊老以八十三高齡，北上出席新政協，而精神矍鑠，腰腳甚健，殊可佩也。」^⑱即便是張氏本人，在會後返回上海向商務印書館職工同仁介紹政協大會盛況時，談及自己的健康狀況亦不無自得之意，他說與會代表中「年長的很多。鄙人年齒排列第二〔第一本應為薩鎮冰，未到會，實際參會人員中以司徒美堂年歲最長〕。有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年高的華僑代表〔應指司徒美堂〕，進出都須人扶攙，鄙人卻不須要」^⑲。由此可見，所謂「腦力衰退」，遇事「甚易坐忘」云云，很可能是有所矜持，故作推託。

其次，擔心與參會諸人不甚熟悉，唯恐「氣類太孤」、「交淺言深」等，亦非充分理由。張元濟雖在以前未與中共方面直接接觸過，但商務印書館內以

及他周邊的交遊網絡一直都有左翼人士的身影。王雲五在分析朱經農被迫辭去商務總經理職務的原因時就認為，朱經農掌館期間處處受到左翼力量的掣肘，致使動輒維艱：「〔抗戰勝利後〕由於共黨之勢焰日張，商務董事會的左傾與投機份子漸抬頭，總管理處又攙入不穩份子，董事會主席張菊生先生逐漸受共黨同路人包圍，以經農為國民黨員，頗加抑制，致措施漸難如意。」^②其筆下的「左傾份子」、「共黨同路人」指的應是陳叔通、謝仁冰等人，這些人與張氏關係深厚，深得倚重。而在中共取得全面勝利前夕，張氏在公開場合多次呼籲和平，反對內戰，此外還為被捕學生發聲，與國民黨政府大唱反調^③；雖然其一再聲稱絕不參與政治，但就其公開表態來看，無疑受到中共的歡迎。所以當時報上評價他「思想前進」，認為「其言論文章，與沈鈞儒、黃炎培等民主人士，志同道合，惟他身未入黨籍，不過站在人民立場上說話」^④。不過，從國民黨的立場來看，張氏的種種表態則是一種政治投機，尤其是在他回絕了擔任上海自救救國會委員職務之後，《中央日報》諷刺其同奔赴香港的民主人士一樣，是「拜紅帽子做爸爸」，揶揄「若張元濟先生者，服官兩代，曾看滄海變過桑田，跟異姓人相處經驗甚豐。他以為今大廈將傾，還何必置身是非場中，自招苦惱？你不僅要為他的老而不死羨慕，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的生機盎然，他還預備創造奇迹，在蘇維埃時代中再顯身手」^⑤。

筆者認為，張元濟的表態行為不應從政治投機角度理解，雖然當時的中間人士之中確實有為數不少的人觀望徘徊。比如，對於新政協會議是否應該召開即有不同意見。陳叔通在與馬敘倫的通信中就指出，只有很少數的人支持從速召開新政協會議，絕大多數認為應該暫緩；之所以不贊成馬上開會，是因為他們腳踏兩條船：一方面與中共暗通款曲，另一方面不少人還身兼國民政府的「國大代表」。是故，當中共「五一」口號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後，很多中間人士沒有公開表態支持，態度模糊的背後其實有為自身考量的因素存在^⑥。

就張元濟而言，其政治傾向性沒有那麼明顯，他之所以作出與國民政府當局相悖的姿態，一方面緣於此時國民黨頹勢已顯，知識份子中的批評之聲已然不勝其數；何兆武回憶道，「1948年底，三大戰役都開始了，國民黨大勢已去，任何人都看得出來」^⑦。當時任教於浙江大學的詞人夏承燾在日記中也表達了對於政府前景的悲觀，他認為「金圓券如不能維持，國民黨更無最後王牌矣。或料時局將急轉直下」。而彼時的社會環境亦是一片混亂，「市場仍無異新正，搶購之風未殺，米價已高至廿餘金圓一斗，尚無買處。傳蚌埠已失，南京岌岌，時局極緊，數日內將有大變」^⑧。另一方面，張氏表態更多的還是從商務印書館的經營角度出發。內戰期間，本就遭受日寇摧殘的商務經營形勢繼續惡化，再加之國民黨派系的正中書局等出版機構分割其業務市場，張氏希望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環境，以利於商務出版業務的重振。他在1949年6月與北京大學教授嚴景耀的信中說，「戰事延長，遍地烽火，人方救死之不暇，詩書自非所亟。一、二月來，全館幾無營業可言，累卵之危，不堪設想」^⑨。此時，張氏正在為化解商務的經營窘境而多方聯絡政學名流，試圖獲得各界支持，而進京赴會無疑是一個展開交誼的絕佳機會，故而以「應酬」為「苦事」似也不盡然。

最後，信中末尾所提理由或是張元濟在向官方委婉提出要求，既希望其子張樹年隨身侍奉，又恐他因此丟掉工作，所以將內情稟明，意在請官方協助妥善解決。

類似這種以退為進、欲迎還拒的舊式文人習慣在張元濟的晚年行事中並不少見。1948年春，張氏獲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國民政府教育部致函邀請他去南京參加院士大會，他最初的回應依舊是自謙婉拒，稱病不往；在給朱家驊和翁文灝的覆信中自謂：「元濟毫無學識，濫廁儒林，枉竊榮名，深慚非分。然得追隨海內賢哲，藉資激勵，自顧菲材，尤深私幸。復蒙寵召，極口〔原文如此，下同〕思趨，只因染患感冒，不克遠行，只可辭謝。」^②經過教育部方面再三禮請，最終於9月22日才在張樹年的陪同下出席會議。

正因為其有這樣自重的意識，所以在1949年8月當上海市政府交際處處長梅達君第一次登門拜訪，並將北京方面有意邀請他參加新政協會議的指示告知時，張氏隨即寫信謝絕^③：

元濟自顧何人，仰邀青睞，不勝慚慙。敝處並未接得當軸電示，亦無等函牘，自審菲材，愧乏貢獻，且年力衰邁，方染微恙，孑身遠行，征途旅舍，諸事躬親，亦苦精力不逮。既奉傳諭，只得辭謝。

對比前述寫給陳叔通的信件，可以看出張氏的請辭理由基本相同，惟梅達君的知會背後有政府的授意，所以他特別指出自己並沒有得到政府更高層或更正式的書面邀請，僅是口頭「傳諭」，「只得辭謝」。緊接着，8月27日，陳毅與潘漢年聯合致書張氏，明確告知他「昨接我黨中央來電，人民政協籌委請先生做為邀請單位代表出席會議，並望於九月十日前抵平」，由於此前張氏聲稱因病無法遠行，陳毅與潘漢年還「特再派周〔而復〕、梅〔達君〕兩同志前來探視，並致慰問之意。如近日貴體轉佳，盼能北上」^④。這次張氏回覆的口風不像上次那般絕然，雖然繼續堅稱「自慚樗櫟，愧乏訏謨，且孑身遠行，憚有種種障礙，再四思維，甚難遽行決定」^⑤，但既然「一時行止尚難決定」，就說明其態度有所鬆動^⑥，只是姿態又未完全放下。隨後，中共方面再度力邀，張氏在完成了這套迴環往復的「禮節程序」後，終於在9月3日決定接受北上之邀。

與此同時，張元濟陸續向周邊親朋好友告知這一決定^⑦。值得注意的是，在與友朋的通信中，張氏着意強調赴會參政實屬盛情難卻，大有迫不得已、勉強為之的意味：「中共招往北平，參與新政治協商會議，經兩月之磋磨，難於堅卻，已挈小兒同往。」^⑧之所以會有此說辭，應存有維護自身形象的考慮。張氏向以遠離政治、專注文教的形象示人，人至垂暮卻投身政治運動，一反常態，難以自圓其說，故而不得不藉機表現自己的屢辭不獲與迫於無奈，以此換取周圍人士的理解。幾年之後，他被選任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再度展現自己「迫不得已」的姿態：「弟以為今之政府與民國之政府迥不相侔。會議既罷，畀我以全國政府委員會又華東軍政〔近改行委〕委員會，均受之不辭，特虛位素餐，殊自恥耳。」^⑨饒是如此，仍然有親友對其參會之舉表示不解，與張氏有較深交誼的藏書家劉承幹即是其中之一：「閱《解放日報》北京開政協

會議，皆有張菊生、周孝懷〔周善培〕之名，遂以電話去問已否啟行，家人回答去已數日，深為訝然。」³⁵

二 家鄉土改與私誼請託

有關張元濟參與新政協會議期間操勞國是、獻策資政的具體情況已經有不少梳理。相較於「為公」的一面，諸如他接受私誼請託、為個人利益奔走聯絡、謀劃活動等「為私」的一面則鮮少被關注。例如，他與藏書家劉承幹等人在建國後的交往活動就很能體現其游走於公私之間的進退之道³⁶。

劉承幹在江南易幟之初，因家鄉嘉興縣遭到政府徵糧而求助於張元濟、周善培等人，希望他們能夠代為向高層反映，以紓民困。1949年6月底，劉承幹派嚴奇初與胞弟劉培餘拜會張氏，請他向陳叔通反映「此次徵糧之民間困苦傾家至自殺者亦不少等情」，張氏「囑遞節略與叔通細述苦情」。但劉氏兄弟意在請陳、張等人直接同政府商談，不願署名出頭，以恐招致不必要的麻煩，故並未答應。而後，在嘉興縣的夏糧徵收過程中，劉承幹通過友人徐子為（時在經營蘇嘉湖長途汽車公司）了解到，「與彼中重要職員談話亦無效果，以彼等全無信用，公事維批准亦不能執行，以下級不能奉命，亦深明白上海、滬得太早，以致各處請款無以應付，甚屬為難」³⁷。

新基未穩之際，中共在具體管理上確有缺乏經驗之處，類似的情況，張元濟亦有同感，他認為「共軍進行過速，其他政務尚未能悉數配合，前途猶多難關，不無杞憂」³⁸。在京參加新政協會議期間，他藉毛澤東設宴招待之機當面進言，力陳江南民瘼；特別指出，在徵糧過程中，有為求減負而大量瞞報的現象，此舉引發實報民眾不滿。有關此事的解決之道，張氏的意見是「此必須由地方公正紳士出面相助」³⁹。可見此時其思想依然有固守傳統的一面，力圖維護地方士紳在鄉村基層治理中的角色，對新政權的治理模式尚未有足夠認識。與之同席的上海市市長陳毅則認為江南的稅賦較之河北、山東等北方省份已不算重，並且沒有抽丁，江南地主過於看重自身錢糧，對收稅多有抗拒，所以官方要加以懲罰，以儆效尤。對此，毛澤東答覆稱等軍隊南下福建之後，江南等地的情況自當好轉⁴⁰。

張元濟回滬之後將會談情況告以劉承幹，並對其下一步計劃提出建議：「菊生之意，陳叔通、馬寅初兩人不久來滬，擬與商一辦法。最好各處聯合具呈，人數愈多愈妙，庶可動聽云云。」但周善培並不贊成張氏此說，「惟伊主張呈文不宜聯合多人，只須各自具呈說明疾苦，以免當道疑忌」，並且勸告劉承幹，「田宜從早售與佃戶，尚可拿着點錢」⁴¹。張氏着眼之處在於擴大範圍，形成聲勢，希望藉此引起當局重視，同時淡化個人居中協調的色彩，而周善培則擔憂這種串聯造勢或許會引起官方的打壓，兩者各有措意。後因徵糧命令已經頒行，共商之下決定推遲至明年再行請願。

隨着政權鼎定，新中國各項建設全面展開，嘉興縣政府開始對劉承幹創建的嘉業堂藏書樓進行整改接管，就私人藏書的處理問題，劉承幹與張元濟多次商議。1949年底，縣政府以拖欠捐稅罪將劉承幹家人楚珍拘捕，劉承幹

為此求助於張氏。張氏允諾可代為遞送呈稿，「蓋別人亦有託其上達也」，同時和其談及時局形勢，表現出對新政權的信心：「此次上海代表大會伊與孝懷皆列席，開一星期，昨日閉幕，即着手組織華東軍政委員會，不久即將成立。現在共產〔應為共產黨〕已成立，蔣只有台灣、海南、舟山三島，無能為矣。共黨已無敵手，美國亦聰明，決不肯徒然犧牲，是以數年之內共黨必無他慮。至於人民，則必艱苦正長云云。」劉承幹從張氏處離開後又轉商周善培，周善培則直言不宜由自己或張氏、陳叔通等人代為傳遞，一來此前相似的請託情況皆未能如意，二來越級呈請，極易得罪下級政府：「〔周善培〕謂數次以事說陳毅，皆碰頂子，因此不願再說。當時毛澤東謂政府極願下情上達。近有數事，如合肥李勤恪之孫媳被吊打受傷之類，經呈訴後，批以查辦而未聞下文。與商楚珍事，則云此等事宜從下級政府呈請，最忌越級。」^{④3}張氏慨允施以援手自然是出於張、劉二人私誼，相較而言周善培的考慮更為老道。後續劉承幹函告張氏，仍擬直接同當地縣區政府溝通解決。

1951年夏，嘉興縣政府擬以嘉業堂藏書樓為基礎組建圖書館，函請劉承幹回鄉參與圖書整理工作，一同籌劃改建事宜。筆者注意到一些關於劉承幹的傳記作品在論及此事時稱他主動將藏書捐獻國家，襄助文教建設，事實上並非如此。根據劉承幹的日記可知，此時他正因家鄉田產拖欠稅款而被追責，畏懼回鄉，但又掛念藏書樓所藏善本古籍，不願放任不管；是故，他就應對之策再度往商張元濟。後者建議他「可覆以開閱多年，內容未詳」作為託詞，劉承幹進而提出希望張氏幫他在陳毅等上海政要面前說情，收購所藏古籍，張氏卻以「共黨不講情面，必無效果」為由拒絕。之所以有此一說，是因為在這之前張氏就商務印書館的經營困境向陳毅請求貸款，遭到了拒絕^{④4}。隨後，劉承幹又求助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負責人徐森玉，後者則讓他稱病拖延，並代其去文化部了解相關情況^{④5}。數月之後，縣政府開始圖書清點工作，張氏建議劉承幹「如政府欲沒收，可據理與爭，否則得寸進尺，伊于何底」，並且主動提出將致函浙江圖書館館長汪大鐵為其交涉。至於劉承幹的藏書，張氏亦表示可以商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出面，代表文物局予以收購，並言稱「私人之物理應保護」。然而後續張氏並未為之盡力奔走，藏書樓於是年底被收歸國有，浙江省圖書館從中分得一萬餘冊善本圖書。當劉承幹將此結果告知張氏時，他的表態又一反從前，站在政府角度竭力回護，令劉承幹相當不滿：「數月曾與談過，伊謂是誰發動可以起訴，今與之談，伊謂我兄是地主關係，恐難挽回。閒談一時有餘，言語之間亦有偏袒，可歎孰甚。」^{④6}

其實在建國之初，張元濟面臨着和劉承幹類似的問題，但他處理家鄉田產的方式更顯高明圓融。新中國成立後，海鹽縣立中學一直租借張氏虎尾浜的祖宅作為校舍房屋，1951年8月張氏將此處房地一併捐贈予海鹽校方，他在捐贈證文中寫道，「本縣縣立中學賃余室教授生徒，歷有年所。比來學者眾，苦無力自建校舍。回憶余母在日，汲汲以余兄弟學業為念。今當推余母之志，以及於全邑之學子，思以先人遺產全部贈與本縣縣立中學，永為校舍之用」^{④7}。相關研究在論及此事時也對張氏晚年熱心桑梓、捐產助學的公益之舉大加表彰。然而進一步考察可以發現，張氏大力支持家鄉文教的背後，正是其再三權衡利弊後的選擇：首先，早在1950年，海鹽縣立中學便致信張氏，

希望他能將祖宅獻出，而並非其主動提出捐贈；張氏還希望如將祖屋捐獻，縣中學能夠給予若干補貼^④。其次，該處房屋為張氏與同輩宗親共有，所以捐贈之事需要獲得同宗共允；在同長房兒媳許廷芬商議時，他認為「海鹽故居現租縣立中學，每年租米十二石，為數甚微。託人代收，收到即被人用去，且新章地價稅極重，以後無法擔任」^⑤。繼續保留祖產經濟上無利可圖，與其如此不如順水推舟，成全校方之意。正是基於上述考量，張氏才會致信海鹽縣立中學，表示「願將該產全部捐贈貴校，永遠作為校舍之用」，並在捐贈事宜完成後專門給海鹽縣長徐永三去信報備^⑥。

同時也要看到，捐贈房產的舉措並不能完全反映張元濟對於新政權基層治理的態度。實際上，早在建國初期他就因土地改革問題致信海鹽縣政府，並與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發生爭論。事緣負責為張氏祖產收租的司賬「因受種種壓迫，不勝惶懼，業經辭職」，改換他人後亦不奏效，「各鄉農民協會不允田主收租，動輒毆打，不敢擔任」，張氏由此致函縣政府，質問「似此租不能收，糧何從納？」^⑦隨後又就土地問題與饒漱石在開會時辯論，遂遭致報復。據張氏同鄉徐綱章對劉承幹所言：「張菊生祖墳被掘，家人尚不使渠知也。菊生於前年冬與饒漱石辯論，饒不懌；又因菊生印刷《土改法》貼於家鄉，開罪幹部，是以有意為難；菊生之族叔因田產事被管押，菊生寫信營救反將此案延擱，縲繼不釋意欲痠斃之也。」^⑧

而隨着土改工作的高潮到來，特別是中共高層多次就土改問題表態，張元濟的態度也隨之改變。早在土改大規模鋪開之初，毛澤東就十分注意「關於江南土改應慎重對待富農的問題」，認為「此事不但關係富農，而且關係民族資產階級。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須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⑨。但是這種「不同」只是方法和策略上的區別，在態度上，中共是非常堅決的，並且對於「有顯而易見的對美幻想、畏懼封鎖及反對土改等等」傾向的工商界人士，政府明確表示「必須當場予以教育，批判其錯誤觀點及錯誤想法」^⑩。此外，毛澤東號召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政協各界「打通思想，整齊步伐，組成一條偉大的反封建統一戰線」，像過好「戰爭關」一樣，過好土改這一關^⑪。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之下，加之對政府的了解增加，在土改完成之際，張氏很快作詩祝賀，極力稱讚新政施行後「農盡服疇，民罕坐食」的欣榮局面：「贏來歲月堪矜貴，爭說今年勝去年。聞所未聞見未見，史家載筆看空前。八口之家百畝田，子輿遺意至今傳。試看廬廬周原上，曠土遊民一例刪。」^⑫

上述張元濟的種種表現恰巧體現了作為一名「文化老人」在改易之際面對新舊交替的環境所作出的因應。一方面是在嶄新的社會大背景下固有的處世經驗不足以應對，自身的慣性思維使得其仍寄希望於以傳統儒術參與基層治理（地方士紳主持徵收賦稅）、試圖以人情私誼作用於公事法理（為劉承幹說項）、對新政權的治理體系未有足夠認識（土改初期的各種不解）；另一方面雖然張氏不能一蹴而就地成為「新人」，但隨着對新政權了解愈益加深，自身態度亦發生轉變，開始有意識地適應全新的政治環境和社會體系、理解新政權的各項政策措施、讚揚所取得的成果；即使有一些未能全部或及時呼應之處，張氏也能夠做到恰當的處置（下詳）。概言之，張氏雖然有「為私」的一面，但卻很好地把握了公私之間的尺度。

三 新社會中的舊文人

1949年12月，張元濟在參加完新政協會議返滬後，又被選為上海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文化界代表。大會閉幕時，他致辭盛讚在中共領導下的上海各界快速恢復的景象，並就中央政府發行折實公債表示擁護^⑤：

最後一件很重大的，是中央人民政府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這不是專用來彌補財政上的赤字，而且為了全國人民利益的生產建設。各界代表，都明白表示熱烈的擁護，今天並且有通電上，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元濟也無庸再贅一詞。各界代表還提出許多辦法，都很有利於公債的推行。元濟料想在上海方面，一定能有光輝的成績。

彼時上海工商界對於政府發行公債多有抵觸情緒，認為這是變相侵佔，據夏承燾日記所記，「午前修齡自滬歸，云上海商人對當局甚不滿，市況蕭條，晚間七八點鐘即掩戶」^⑥。而張氏之所以站出來表態，一方面顯示其對於新政權的擁護，更關鍵的是希望藉此機會由商務印書館承接政府的債券印製業務，為此他還專門致信陳雲尋求支持^⑦。不久，新中國的紀念郵票、第一套普通郵票以及多種印花稅票相繼交由商務印製，《毛澤東選集》編選完成後也分與部分交由商務承印。事實上，根據出版總署的調查情況顯示，中華書局在建國前長期負責國民政府的鈔票印製印務，無論是印刷機器質量還是印製規模均優於商務，但1949年後中央政府卻將諸項任務交付商務，這與張氏此前的努力當不無關係^⑧。

1949年底，商務印書館工會成立，張元濟應邀前往寧波同鄉會出席成立大會並發表演講，在演說過程中情緒激動，突然跌倒，隨後中風不起^⑨。之後即使張氏臥病在牀，仍然多次致信政府高層，除了關心時局，就內政外交表態外，還尤為關心他們的身心健康，展現出「文化老人」重視人情交誼的老派作風。1951年春，張氏致信潘漢年，稱「元濟仰荷政府當日知愚，列名口要，雖臥病在牀，於外事多所隔闕，仍思竭其土壤細流之力，仰替新猷」^⑩。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張氏馬上致信陳叔通，請其轉告毛澤東有所節勞，為國珍攝：「今斯氏逝世後，弟竊謂毛公責任必大加重，地球上國際大事勢必有一半加於其身。其人體魄健碩，然年已六旬，總不宜過於勞苦。……毛公現在一言一動為全球所注意。我國際地位逐漸增口，而其個人負擔亦必更加辛苦。每一念及，極為憂慮。兄口相見，為我致意，勸其視一己宜與國家並重。」不僅如此，張氏還專作兩詩希望為毛澤東六十歲生日祝壽，但由於不知道其生日具體日期，所以請陳叔通代為探示，張氏在信中特別指出，「毛公盛德大業，六十生日人民宜有頌祝之舉」^⑪，後因陳叔通告訴他中共及毛澤東均不祝壽方才作罷。又如，1952年夏，在聽聞饒漱石生病的消息後，雖然此前兩人圍繞土改政策有所齟齬，但張氏還是很快去信華東局統戰部部長吳克堅表達慰問意：「前聞饒主席政躬違和，易地療養，近未知已康復否？正為馳念。」^⑫

舉凡以上數端，儘管都在展示張元濟熱忱謀國並與官方積極互動的一面，但是並不意味着他對中共的施政心悅誠服；事實上，由於長期身受傳統儒家思想的浸染，他對中共過份強調階級鬥爭的治理模式亦多有不滿。

「三反」、「五反」運動期間，雖然伊始陳毅即專門給「有關方面打過招呼」，不讓打擾張元濟^⑤，但張氏對於運動形勢非常關注，針對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有悖儒家倫理的現象，他在私下場合有所批評。1951年夏，張氏有感於社會形勢，作詩抒懷：「有父攘羊子為證，此心此理古今同。緣何甘自揚家醜，祇羨嘉名是直躬。認賊作父古所醜，認父作賊今所榮。室舉非濫趨時者，要以時中得聖名。」^⑥詩中提及政治運動中父子互相檢舉揭發的現象，張氏認為這與中國自古以來的孝悌文化觀念不合，不應提倡。為此，他還引用古典與陳叔通討論此事。在陳叔通看來，父子不相隱、親朋互揭發是公私分明的表現：「自來處此種變故而能合理者，以禹為典型。禹不以舜殺其父而不與舜合作，仍受命治水，實即今日之所謂為人民服務。禹之外，有三說：一為《春秋》所載〈大義滅親〉；一為孔子『子為父隱，父為子隱』之說，尚涉含糊；一為孟子〈答桃應問〉。舜竊負而逃，亦是不澈底，似仍以禹為公私分明，未知有當否？」^⑦而張氏則反對這種理解，認為禹代父治水不是單純的為人民服務的表現，而是子盡孝道，以贖父愆：「尊論禹不以舜之殺其父而仇舜，且受舜命而為之治水，是正為人民服務。弟以為此正為禹之能盡子道，竭己力以贖父罪也。」在他眼中，「子有罪若小焉者，當懲戒之、教誨之；若其大也，遮受國法，豈能以一隱了事？父有過，如干犯國法，傳為子者到庭作證，不可逃避，但可申明不願為證，代父受刑，是為儒教之責」^⑧。

另外，對於中共在「三反」運動中為防止政府機關公務人員的墮落變質而提出的「反貪污」、「反浪費」等口號，張元濟亦有相反看法。在致陳叔通的信中，他將中共政策比附為先秦諸子中的墨家學說，認為其主張雖好，但不合人性，並非從根本上治理貪腐的方法；他主張以儒代墨，高薪養廉^⑨：

凡人孰不好安逸而惡勞苦，共產之刻苦耐勞實有可過人之處，然我以為只能行之於少數之同志，而不能行之於多數之常人。即能行之，亦只能持之短暫，而不能持之於久遠。我以為運動終結以後，必須有根本治理之方。……弟竊以為亟宜採夫重祿之義，而去墨子大穀之弊。雖不能說貪污從此絕迹，諒可較勝於目前。

凡此種種，均可見張元濟同新政權相違和的一面。但他較為隱晦地將這種議論局限於私下場合，只將之作為一種私人感受訴諸至親摯友，在公開的表態中他依舊從大局着眼，緊跟擁護。就在中共提出「反貪污」、「反浪費」口號之後，張氏隨即指示商務印書館上海方面負責人陳懋解，令其盡快響應當局呼籲，馬上在商務內部進行裁汰冗餘的部署：「陳雲君政治報告，亟需厲行節約，渡過經濟難關，以俾建設。鄙見本館容有複沓機構及可省之浪費，可否由董事會提議，仰承政府宗旨，特設一××節約委員會，籌劃進行。人選由總管理處及工會推出。是否有當，請代提出討論。」^⑩

考慮到張元濟自身具有的社會影響力，加之其一貫的表現，雖然老邁病衰仍得到重用。1953年上海文史館籌備期間，統戰部門擬將館長職務委諸張氏^⑪。張氏在得知這一消息後馬上以身體原因為由上書請辭，稱「弟現狀詎能據此？果來言者，弟必堅辭」^⑫。他之所以卻而不就，一個重要原因是擔心得

罪故舊。其出任館長的消息甫一傳出，就有不少親朋登門說項，希望張氏能夠舉薦或提名他們擔任文史館員。而張氏為避免厚此薄彼，開罪於人，故對於一切請託要求皆置之不理，但應對不同關係的拒絕方式則體現了其周全的處事智慧。1952年11月，劉承幹前往周善培處，為曹叔彥、許經農、朱庶侯三人謀求入館之事，周善培告知其「此次設立文史分館主持人為周而復，孝懷與張菊生、黃涵之、江翊雲及某君〔徐森玉〕五人可提名，再由當局派員實地調查」。因此，劉承幹復往張氏處，並「請其為錢沖甫等提名」，張氏則稱「文史館事並不過問，係由周孝懷、江翊雲（庸）、徐森玉三人專司提名之事，若欲渠將名單轉交亦無不可」。結合教育家蔣維喬的日記可知，1953年文史館在籌備階段確實對各方推薦的館員人選進行了考察汰選^③，而張氏因年事原因沒有參與此項工作，故周善培所說確是。但在此前的薦人階段，張氏實有相當份量的推薦權。之所以在答覆劉承幹時委婉拒之，或許有其進一步考慮：如答應為劉承幹所保薦的人提名，則後續亦當提名劉承幹，但以其個人情況，並不符合官方設立文史館救老濟窮的初衷。劉承幹事後在日記中即提及，「菊生初以為余自己有所希冀，渠願作書推轂，既言君是地主，在滬有房產，未免吃虧」^④。故而為免有負於故交，同時也不違背官方規定，張氏才作如此處理。

又如，同為世交的冒廣生致信張元濟薦人入館，張氏亦以辭職未就，不問館事為由予以婉拒：「前得手書，屬為孫宇晴世兄推薦文史館事。維時陳市長〔陳毅〕以館長相責，弟正堅辭，轉覺未便啟齒，業經向宇兄陳明。近已將館事完全辭去，異日如有機緣，當再力圖報命。」^⑤至於關係一般者，如同盛錢莊董事葛蔭梧等的奉求，張氏皆予直接回絕^⑥。

不過，政府方面並沒有接受張元濟的請辭，針對他所擔憂的身體情況、人情請託等問題，官方許諾其只需掛名，不必視事。但在張氏看來，一旦就任，「終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此亦無可如何之事」，所以對於政府的再三敦請，張氏一直堅持辭謝。最終在李維漢、周而復登門勸勉下，張氏答應出任上海文史館館長一職。他在給陳叔通的信中提到：「聞人言，市府須開會議決，謂覓一資格相類者殊無其人。甚矣，人惟乎名，豬惟壯也。如對方提出不必問事，弟意亦祇可勉應從。」^⑦

除了上海文史館館長之任以外，當局重用張元濟的另一舉措是選舉其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之所以賦予他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大概與這一時期中共對待資產階級統戰對象的態度有關。1954年李維漢在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報告，指出三類資產階級人物應該予以重點安排：「1.政治上可靠，靠攏我們，至少不擋路。2.要有積極作用。……3.要有相當的代表性。」具體的安排原則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既要保證黨員加進步力量佔顯著優勢並處於領導地位，又要包含需要包含的民主人士」。根據上述標準，張氏無疑是絕佳人選，李維漢在報告中專門將其作為典型：「還要照顧到各種歷史關係，如……舊政協時提張元濟作代表就因為他參加過戊戌政變，……這些歷史關係第一屆政協時都是照顧了的，現在也不能不管。各個社會集團也都要照顧到，不要使人感到我們有偏愛。要全盤考慮，通盤打算，要考慮如何平衡。」^⑧

早在人大代表選舉期間，張元濟就向冒廣生表示，「普選投票，舉國若狂，……老輩可謂躬逢其盛矣」^{①9}。在正式當選之後，陳叔通勸告他，「公以東南人望，被選為代表，可以不來京。昨周總理、李部長維漢尚以為言，屬傳達，如有意見可以書面寄來」^{②0}。但是張氏立即表態，聲稱要扶病北上，為國盡忠。宋雲彬的日記中對此事亦有記錄：「陳叔老接張菊老（元濟）自上海來信，謂當選全國人民代表無上榮幸，必當扶病來京出席，死在北京亦所欣然云云。按菊老自參加第一次政協全體會議回滬後，即患半肢風癱，至今臥牀不起，年齡較叔老長九歲，今年為八十八歲（依中國習慣算法），在勢萬不宜來京出席，叔老已去函婉加勸阻矣。」^{②1}就政府方面而言，選舉張氏擔任人大代表是出於統戰考慮，他的當選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作用，為其個人健康計，故婉言建議其靜養為宜。就張氏來說，未嘗不能體察政府的實際用意（據黃炎培探訪張氏情況，稱其「腦力甚清醒，能工寫，但腳不能動」^{②2}），但正是因為其身份具代表性，所以更需要及時表態，以示呼應。而從這種互動背後，也依稀可以管窺張氏在新社會的調適情況。

四 餘論：依違之間的調適之道

類似張元濟這樣的「文化老人」在建國前後為數不少，新中國成立後，陳垣的人生境遇就與之頗為相似，其在易代之際的態度與反應亦有助於我們進一步體察該群體的多元樣態。黃炎培在1949年2月20日日記裏專門抄錄了一則報紙報導，記載了北平解放前夕陳垣的活動：「今日《華商報》載：陳援庵（垣）史學家，輔仁大學校長，召集學生，公開懺悔，逐去校中某神父，願重新做人，陳，天主教徒。」^{②3}不過這並不是陳垣首次向當局表態，據鄧之誠回憶，「辛未，〔陳垣〕專任哈佛燕京社學侶時，託陳振先向蔣中正『輸誠』，竟無所遇，乃喟然嘆曰：最後一條戰線，只有輔仁大學矣！翌年，乃謀回任輔仁大學校長，以至解放。」^{②4}也正是因為在解放以前犯過這種「錯誤」，所以新基肇始，他便竭力表態，努力迎合新的形勢環境。鄧之誠記述：「閱報，昨日天橋控訴所謂三霸一虎者：……此皆昔日所謂混混，早應法辦。聞陳援庵首先起立發言：一、慰問受害者；二、槍斃三霸一虎；三、捉蔣介石惡霸；四、捉美帝惡霸。每發一語，掌聲雷動，繼連呼五種萬歲，愈呼聲愈高，至於嘶不成聲。」^{②5}

更有甚者，相較於張元濟在土改初期的反對與不解，陳垣表現得更為進步；即便是和家人的私下談論，其仍相當注重「政治正確」。他說，「關於土改事，我們應積極贊成政府政策及法令」，並且告訴家人，要關心土改，稱「這是幾千年沒有的事，我們躬逢其盛，何幸如之」。而對於儒家倫理的揚棄，他也較之張氏更為堅決：「土地改革是人民政協《共同綱領》規定的，……我們應堅決擁護這政策。如果我們父兄是地主，我們就要鬥爭我們的父兄；如果我們自己是地主，我們就要鬥爭我們自己。換言之，我們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如果我們是地主階級，我們就要背叛自己的階級來作自我鬥爭，我們是要廢除地主階級，但不是要消滅地主的肉體。」^{②6}

無論是陳垣還是張元濟，他們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都在主動適應新的形勢，與這種自覺意識相伴的還有作為「文化老人」飽經世事的老道謹慎。張氏在1949年11月9日給商務印書館天津、濟南分館經理孫偉的信中曾談及對時局的看法，態度十分審慎，「竊有陳者，時局驟變，萬事更新，應付一切，無論對內對外均非易易」^⑦。於此複雜形勢之下，他們的一舉一動無不小心翼翼，並且十分注重個人在公開場合的形象。陳垣在驅逐輔仁神父後給三子陳約的信中告訴他，「報載輔仁事，應剪寄我，俾知外間如何說法。或有關我個人事，亦望剪寄」。此後的陸續數封家書，陳垣均在信中註明：「此後對我的事，想續有登載，望隨時剪寄，以便省察。」而他之所以這麼做，原因在於「俾知外間對此事之批評如何，以作檢討」^⑧。也恰是由於這種謹慎應對，使得他能夠在新舊交替的大變局中得以平穩轉身，甚或躋身新貴。在1952年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鄧之誠即觀察到「陳援庵在來賓之列，最得意者也」^⑨。

不過，並不是所有讀書人都能像張元濟、陳垣這樣在鼎革之際保持如此從容自覺的姿態。特別是一些傳統文人習氣較重的老派讀書人，他們雖然也對中共政權持擁護態度，但一時無法做到亦步亦趨；不僅如此，對於積極順應時勢者，尚有鄙夷排斥之感。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們對於服裝的觀感，在傳統文化觀念中，髮服更替，茲事體大，所以許大齡在看到陳垣「已穿藍布制服」後，會揶揄「妙極」二字；而謝興堯在談及同顧頡剛見面情況時，尤為指明其「已幹部服矣」^⑩；夏承燾在拜訪老友時也特別記錄到「見邵裴老〔邵裴子〕，亦改戴八角帽矣」^⑪；又如宋雲彬在建國前夕偶遇林山，林山再三詢問他「為何穿長袍」，宋雲彬則反問「君何以穿短裝」，彼此「相與大笑」^⑫。可見不同的服飾穿着在讀書人眼中寓意不同的政治態度。

除了服裝問題，包括「文化老人」在內的一眾知識份子紛紛熱衷學習俄語，也是可以補充的印證。張元濟赴京參加新政協會議期間，曾就商務印書館下一步的出版選題求教於政學要人，其中陳叔通「言俄華字典甚需要」^⑬。彼時包括各界名流在內的許多人正在學習俄語，以沈鈞儒為代表，宋雲彬對此舉相當不以為然：「振鐸言小箴〔鄭小箴，鄭振鐸女兒，薩空了之妻〕正努力學俄文，每星期三小時，與沈衡老、薩空了、愈之〔胡愈之〕及茲九〔沈茲九〕等同學，在東總布衚衕衡老公館，共聘一俄國教師。衡老年已七十有六，過去未習外國文字，乃欲學俄語。謂為好學不倦，不知老之已至歟？將趨時學少年，以沽名釣譽也？」^⑭

此外，宋雲彬在出版總署工作期間一度負責各類教科書的審定工作，對於新編教材過份強調政治性而忽略內容質量的現象，其亦有議論：「近來朋輩中頗有強調所謂思想問題者，以為只要思想搞通，文章寫不通也無關重要；又，凡解放區刊布之小冊子，不論其文字如何不通，必奉為至寶，大有『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之概。……文句不通，出人意表……」對於這一情況，出版總署內部亦有不同的態度，開明書店的傅彬然始終對這些解放區的書籍「讚美不置」，而「〔葉〕聖陶曾因此大為不快，頗有辭職不幹之意」^⑮。宋雲彬和葉聖陶的態度自然都是文人本色的體現，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難免有些不合時宜。

回到本文的主人公張元濟身上，作為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長，他區別於其他「文化老人」的獨特之處就在於除了具備傳統儒士性格之外，還兼有現代商

人經濟務實的一面，從這個角度思考，也就能夠更好地理解他在新中國成立後作出的政治選擇。換言之，在中共方面看來，張氏既是需要團結合作的統戰對象，也是有必要限制改造的資產階級，這兩者的轉換或側重受制於不同時期中共政策的調整^⑥，也取決於其自身的表現。建國初期周恩來代表政府對資產階級予以定性，認為「資產階級份子哪有那麼循規蹈矩的，你要他們做甚麼他們就做甚麼？損人利己，唯利是圖，投機取巧，這三句話概括了資產階級的本質。他們是要按照這個方向發展的，因此，必須進行長期的鬥爭」^⑦。與此同時，中共又要通過「三反」、「五反」等運動形式來「徹底查明私人商業的情況，以利團結和控制資產階級，進行國家的計劃經濟」^⑧。如此雙重作用下，張氏及時審時度勢、認清現實，找準自身在新形勢下的位置並作出「認同」表態。

這種「認同」並非出於違心的脅迫，更非所謂的簡單投機；事實上，彼時社會各界對於新政權的態度較為複雜，以張元濟所在的上海工商界為例，就有相當一批人士對於緊跟表態、高調擁護的態度有所保留。1949年7月，壽墨卿同岳父馬敘倫談及時局，提到滬上經濟形勢一片蕭條，認為民主人士的講話「說的都是門面話、歌頌語，既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也沒有接觸到核心問題和真實原因」，「認為是打官腔，騙小孩」^⑨。有別於類似的表面觀察，張氏的考量則更能體現出其深謀遠猷。從現實實際角度而言，順應新政權、適應新環境是幫助商務印書館重振的基礎；更進一步來看，服膺選擇的背後是其個人際遇同家國大勢的結合。在此過程中，他雖時有不滿或不解的情緒流露，但這種私下場合與公開行事之間稍不同調的「尷尬」，並未影響到其最終的「認同」選擇。體察暮年張元濟在處世應變時的進退依違之道，不惟助於補充對其了解，超越以往的刻板印象；抑有進者，對於不同群體在歷史的激盪浮沉之間的多樣態，當有更為深入的認知。

註釋

① 張元濟：〈告別詩十首·別商務印書館同人〉（1952年初）、〈輓李拔可〉（1952年9月），載《張元濟全集·詩文》，第四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220、228。

② 較有代表性的論著，如周武：《張元濟：書卷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汪家熔：《張元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盧仁龍：《中國出版家·張元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張學繼：《嗜書、藏書、出書的一生：張元濟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8）等。

③ 參見陳尚君：〈最後的雅集 不朽的完人——張元濟先生的朋友圈和人生志業〉，《文匯讀書周報》，2017年10月16日，第1、2版。

④⑤⑥ 鄧之誠著，鄧瑞整理：《鄧之誠文史札記》，修訂本，下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頁1176；1146；675。

⑤ 張廷銀、劉應梅整理：《王伯祥日記》，第十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4627，1951年4月17日。

⑥ 《王伯祥日記》，第十冊，頁4396，1950年2月4日。

⑦ 楊鳳城：《中國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理論與政策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77。

⑧ 許紀霖：《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433。

- ⑨ 如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1949年後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側影》（北京：三聯書店，2013）。
- ⑩ 這方面的代表著作，可參見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維德爾(Christine Vidal)：〈與新政權結盟的知識份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幾個側影(1949-1952)〉，載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當代史研究》，第三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72-90；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沈志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 ⑪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日記》，第七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53，1919年4月14日。
- ⑫ 引自海寧市檔案局(館)整理：《宋雲彬日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227-28，1949年9月24日。
- ⑬⑭⑮⑯⑰⑱ 張元濟：〈致陳敬第〉，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416；427-28、429；417-18；420；428；431、430。
- ⑲ 〈張元濟啟事〉，《大公報》，1948年12月14日，第1版。
- ⑳ 南極：〈張元濟的妙語〉，《鐵報》，1948年12月31日，第2版；〈張元濟自謂老耄無法「行動」〉，《工商晚報》，1949年1月6日，第2版。
- ㉑ 顏惠慶著，上海市檔案館譯：《顏惠慶日記》，第三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頁1061，1949年5月10日。
- ㉒ 參見葉聖陶著，葉至善整理：《葉聖陶日記》，中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1130，1949年9月10日。結合張元濟日記，並參考一同赴宴者黃炎培、宋雲彬等人日記(參見黃炎培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第十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12]，頁277，1949年9月11日；《宋雲彬日記》，上冊，頁219，1949年9月11日)，可知此次宴會時間應為9月11日，葉聖陶所記時間有誤。
- ㉓ 《宋雲彬日記》，上冊，頁219，1949年9月11日。
- ㉔ 張元濟：〈出席政協會議之回憶〉，載《張元濟全集·詩文》，第五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239。
- ㉕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846。
- ㉖ 參見張元濟：〈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致詞〉，載《張元濟全集·詩文》，第五卷，頁225-27；〈致吳國楨、宣鐵吾〉，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二卷，頁102。
- ㉗ 天神：〈張元濟思想前進〉，《飛報》，1949年4月29日，第2版。
- ㉘ 秉直：〈張元濟自救了〉，《中央日報》，1948年12月15日，第4版。
- ㉙ 陳叔通在致馬敘倫的信中即提及「盛丕華較弱」，意指其態度不夠堅定，「怕影響身家安全」。參見范堯峰：〈對陳叔通手札的若干註釋〉，載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一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110。
- ㉚ 何兆武口述，文靖執筆：《上班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2)，頁7。
- ㉛ 夏承燾著，吳蓓主編：《夏承燾日記全編》，第八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頁4442、4447，1948年10月27日、11月7日。
- ㉜②③ 張元濟：〈致嚴景耀〉，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二卷，頁8。
- ㉝ 參見張元濟：〈致朱家驊、翁文灝〉，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386。張人鳳、柳和城編著的《張元濟年譜長編》，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頁1294亦收錄此信，但所註頁碼為《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一卷，頁484，有誤。
- ㉞① 張元濟：〈致梅達君〉，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195。
- ㉟④⑤⑥⑦ 張人鳳、柳和城編著：《張元濟年譜長編》，下卷，頁1328；1342；1343；1369；1408。

- ⑳ 張元濟：〈致陳毅、潘漢年〉，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二卷，頁391。
- ㉑ 顏惠慶記：「萬來訪，我沒有見他，因為我正在接待張元濟，他準備去北方。」參見顏惠慶：《顏惠慶日記》，第三卷，頁1076，1949年9月5日。
- ㉒ 張元濟：〈致張國淦〉，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二卷，頁290。
- ㉓ 張元濟：〈致黃炳元〉，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三卷，頁189。
- ㉔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六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頁281，1949年9月23日。
- ㉕ 張元濟與劉承幹的交誼研究，參見柳和城：〈出版家張元濟與藏書家劉承幹的交往〉，載《書裏書外：張元濟與現代中國出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551-68。該文主要關注民國時期東方圖書館（由涵芬樓擴建）與嘉業堂藏書樓在收售圖書、刊刻古籍等方面的合作情況，有關兩人在建國後的交往尤其是私事往來則未有涉及。
- ㉖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六冊，頁252-53、259，1949年6月29日、8月7日。
- ㉗①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日記》，第七卷，頁403，1949年10月11日。
- ㉘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六冊，頁296、302，1949年10月23日、11月9日。
- ㉙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六冊，頁315-16，1949年12月12日。
- ㉚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七冊，頁19，1951年3月22日。
- ㉛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七冊，頁46、94，1951年6月9日、10月9日。
- ㉜ 張元濟：〈捐贈遺產虎尾浜房地與本縣縣立中學證文〉，轉引自張人鳳、柳和城編著：《張元濟年譜長編》，下卷，頁1363。
- ㉝ 參見張元濟：〈致張德培〉，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二卷，頁378-79。
- ㉞ 張元濟：〈致許廷芬〉，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一卷，頁485。
- ㉟ 參見張元濟：〈致海鹽縣立中學〉、〈致海鹽縣長〉，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三卷，頁645、651。
- ㊱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七冊，頁6，1951年2月16日。
- ㊲ 周恩來：〈關於對新區土改徵糧指示草案修改意見給劉少奇的電報〉（1950年2月17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117。此處所引用文字為毛澤東在周恩來原稿上所加。
- ㊳ 周恩來：〈中共中央關於邀集上海工商界代表座談事給陳雲等的電報〉（1949年8月17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頁268。
- ㊴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6月23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80。
- ㊵ 張元濟：〈一九五二新年有感〉（1952年初），載《張元濟全集·詩文》，第四卷，頁218。
- ㊶ 張元濟：〈上海二屆代表會議張元濟閉幕詞〉，《大公報》（上海），1949年12月16日，第1版。
- ㊷ 夏承燾：《夏承燾日記全編》，第八冊，頁4564，1950年4月4日。
- ㊸ 參見張元濟：〈致陳雲〉，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二卷，頁386。
- ㊹ 參見錢炳寰編：《中華書局大事紀要：1912-1954》（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33-42；戴孝侯：〈黎明前後——我在商務長期工作中的一個片段〉，載高崧等編選：《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389。
- ㊺ 關於張元濟中風的原因存在不同說法，亦有人認為他因遭到羞辱而昏倒。參見陳敬仁：〈張菊生（元濟）靠攏的前前後後〉，《自由中國》，1950年第3卷第4期，頁136-38。此說被張氏文孫張人鳳否認，詳參劉怡伶：〈張元濟中風原因的兩種說法——陳敬仁VS.張人鳳〉，《傳記文學》，第120卷第2期（2022年2月），頁123-34。
- ㊻ 張元濟：〈致潘漢年〉，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三卷，頁511。

- ⑥4 張元濟：〈致吳克堅〉，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二卷，頁96。
- ⑥5 張元濟：〈無題〉（1951年5月），載《張元濟全集·詩文》，第四卷，頁210。
- ⑥7 陳叔通：〈陳敬第致張元濟函〉，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二卷，頁417。
- ⑦0 張元濟：〈致陳懋解〉，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二卷，頁444。
- ⑦1 吳昱關注到許寶衡在建國初期加入中央文史研究館的曲折歷程，藉其背後的人事糾葛和時勢發展等角度來探討新中國早期的知識份子政策。參見吳昱：〈新中國與舊文人關係之側影：以許寶衡加入中央文史研究館為中心〉，《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3期，頁195-202。其主旨關懷與本文較為密切，亦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 ⑦3 林盼、胡欣軒、王衛東整理：《蔣維喬日記》，第八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頁3868，1953年6月8日。
- ⑦4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七冊，頁220、221，1951年11月3日、7日。
- ⑦5 張人鳳整理：〈張元濟致冒廣生函六十八通（三九）〉，載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二十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174。
- ⑦6 參見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七冊，頁229，1952年11月27日。
- ⑦8 李維漢：〈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和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安排問題〉（1954年3月25日），載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205-206。
- ⑦9 〈張元濟致冒廣生函六十八通（四二）〉，頁175。
- ⑧1 《宋雲彬日記》，中冊，頁466，1954年8月28日。
- ⑧2 黃炎培：《黃炎培日記》，第十二卷，頁236，1954年3月3日。
- ⑧3 黃炎培：《黃炎培日記》，第十卷，頁187，1949年2月20日。
- ⑧5 鄧之誠：《鄧之誠文史札記》，修訂本，上冊，頁570。
- ⑧6⑧9 陳智超編註：《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1082、1177；1078、1081。
- ⑧7 張元濟：〈致孫偉〉，載《張元濟全集·書信》，第一卷，頁498。這種謹慎姿態也折射出當時知識份子群體的普遍狀態，在思想改造大潮中，夏承燾即言，「近日為新舊對力吹求時代，措語尤當謹慎……人但求不反動，不落伍」。參見夏承燾：《夏承燾日記全編》，第八冊，頁4642，1950年10月23日。
- ⑧9 鄧之誠：《鄧之誠文史札記》，上冊，頁518；下冊，頁707-708。
- ⑨1 夏承燾：《夏承燾日記全編》，第八冊，頁4686，1951年3月10日。
- ⑨2 《宋雲彬日記》，上冊，頁178，1949年6月3日。
- ⑨3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日記》，第七卷，頁407，1949年10月18日。
- ⑨4 《宋雲彬日記》，上冊，頁244，1950年2月7日。
- ⑨5 《宋雲彬日記》，上冊，頁210，1949年8月19日。
- ⑨6 有關建國前後中共與資產階級關係的梳理，楊奎松作了系統總結。詳參楊奎松：〈建國前後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頁1-25。
- ⑨7 周恩來：〈關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問題〉（1952年6月19日），載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28。
- ⑨8 毛澤東：〈中央關於在五反鬥爭中及其以後必須達到的八項目的的指示〉（1952年3月2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353。
- ⑨9 周恩來：〈關於上海產業界對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反應的批語和電報〉（1949年7月29日、8月4日），載《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頁187-88。此處徵引文字為註釋內容。